

朱子《近思录》指略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 湖南 永州 425006)

摘要:《近思录》是朱熹为建立儒家道统所编撰的著作。此书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订,依次辑录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有关言论和事迹,同时也反映了编选者朱熹、吕祖谦自己的思想。它既是一部四子的语录,也是一部反映着六人的共同思想的精华录。在宋元明清时期,《近思录》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入门性、阶梯性的学术书。

关键词: 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订;流传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3-0102-06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濂溪研究所所长,学报主编,主要研究儒家道家哲学、先秦诸子学及民国学术史。

一、《近思录》的内容大意

《近思录》全书共收录语录六百二十二条,取材的四子著作据茅星来查实,有以下十七种:周敦颐:《太极通书》(今通作《太极图说》、《通书》二种);程颢程颐:《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传》、《程氏经说》、《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今通作《二程集》);张载:《横渠先生正蒙》、《横渠先生文集》、《横渠先生易说》、《横渠先生诗说》、《横渠先生礼乐说》、《横渠先生乐说》、《横渠先生礼记说》、《横渠先生论语说》、《横渠先生孟子说》、《横渠先生语录》(今通作《张载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常所说北宋五子之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邵雍,学者尊称康节先生。在《近思录》全书中,没有选取他的语录。但是卷五第十五条从《程氏遗书》中选取程颢之语,间接引用了邵雍的话,所以也可以说,《近思录》仍然是五子的语录。这条语录说:“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

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来。”这段语录完全复述邵雍的意见,而没有二程的评论,表明在这一阐述上二程对邵雍完全赞许。特别是这段话还融入了张载的著作,见于今本《经学理窟·诗书》,并且也为朱熹的《诗集传》所采纳。朱熹的引用与《程氏遗书》略有不同,《诗集传·鹤鸣》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云。’”文后“吾闻诸邵子云”一句,表明朱熹引用的也是二程的原话。

二程与邵雍不仅同时,而且同地,切磋交往中,对邵雍多所赞许,常将他与张载、司马光、吕公著并提。如说:“张子厚、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

* 收稿日期:2005-02-25

实。”“君实之能忠孝诚实，祇是天资，学则元不知学。尧夫之坦夷，无思虑纷扰之患，亦祇是天资自美尔，皆非学之功也。”二程品题邵雍的诗句，认为境界超过了庄周，甚至可以接踵孟子。如说：“观万物皆有春意。尧夫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若庄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荡之场。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言来，直是无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尧夫皆不恭之甚。‘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元未有人道来。”朱熹也是如此，不仅对邵雍“先天太极”的易学思想多有吸收，对于他治学经世的整体气象更有不少称道，如

说：“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后敢如此！因诵其诗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伯大铺舒。’可谓人豪矣！”大概正因为邵雍之学本由“天资自美，非学之功”，后辈初学“岂易及哉”，所以朱熹没有直接选取邵雍的语录，然而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义管中窥豹，邵雍治学的纯正、坦夷、放旷可见一斑了。

《近思录》全书六百二十二条语录是分类编纂的，共分为十四类，每类厘为一卷，共十四卷。十四卷的标题，朱熹最先草拟的字句不甚规整，但表述明确。（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近思录》逐篇纲目”）后代如叶采、茅星来均加以规范，删繁就简。字句整齐了，含义却受到些微拘束，不过总体上并不超出儒家宗旨。常见的三种标题是这样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朱熹	道体	为学大要	格物穷理	存养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 齐家之道	出处进退 辞受之义
叶采	道体	为学	致知	存养	克治	家道	出处
茅星来	道体	为学大要	格物穷理	存养	省察克治	齐家之道	去就取舍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朱熹	治国平天下之道	制度	君子处事之方	教学之道	改过及 人心疵病	异端之学	圣贤气象
叶采	治体	治法	政事	教学	警戒	辨别异端	总论圣贤
茅星来	治道大要	治法	临政处事之方	教学之道	警戒	辨异端	观圣贤

其他如江永完全依循朱熹的标题，张伯行完全依循叶采的标题，今人陈荣捷则二者并存而以朱熹为主。

各卷标题下，叶采和茅星来的注本都概括出了本卷大旨，简明扼要地说明本卷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意图，就中尤以叶采的概括最为精炼。兹将叶采所作的各卷要旨抄录于下，以便总揽：

卷一道体：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卷二为学：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凡矣。

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

卷四存养：此卷论存养。盖穷格之虽至，而涵养之不足，则其知将日昏，而亦何以为力行之地哉！故存养之功，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列乎二者之间也。

卷五克治：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即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也。

卷六家道：此卷论齐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则施之家，而家可齐矣。

卷七出处：此卷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

卷八治体：此卷论治道，盖明乎出处之义，则于治道之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耳。

卷九治法：此卷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政刑有一而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卷十政事：此卷论临政处事，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

卷十一教学：此卷论教人之道，盖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天下，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卷十二警戒：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尝（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卷十三辨别异端：此卷辨异端。盖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心者甚矣。

卷十四总论圣贤：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

断自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萇、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儒家教学读书,最讲究因材施教,循序而进,不躐等,不陵节,经传注疏,原原委委。至程朱时立书院教授,尤其注重根基门径,先后次第,遂使理学很快成为一有体系的学问。《近思录》的编纂也是如此,全书各卷无不体现着“次第”的意图。所谓万事开头,先要讲明道体,以总摄人生,所以第一卷是“道体”。明白道体,然后就懂得学习的重要,儒家自孔孟荀以至汉唐诸子,无论主张性善性恶都首重“劝学”,所以第二卷是“为学”。懂得学习,就需要读书求知,经传注疏,各有次序,慎思审问,都有方法,所以第三卷是“致知”。儒家主张“学以为己”,最反对“记问之学”,而倡导“反躬自省”,书读得熟了以后,该要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优柔厌厌,切磋沉潜,所以第四卷是“存养”。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行,儒家学不外行,“学至于行而止矣”,既读了书,又能反躬,下一步就要力行,所以第五卷是“克治”。古人十岁曰幼而学,三十曰壮而有室,四十曰强而仕,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读书、反躬、力行之后,就可以经营家室,所以第六卷是“齐家”。古人以家事国事为一体,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果然三十能立,就可以学优而仕,而出仕先要明了世事人情,审时度势,自处于中道,所以第七卷是“出处”。懂得了自处,又可以利人,该要手援天下,济国济民,这就首先要清楚治道,明白大体,所以第八卷是“治体”。明白了治道之大体,还要能具体而微,长于法术,足于策略,所以第九卷是“治法”。孔子称“人之道,政为大”,立国须有规模,为政务出淳厚,正德、利用、厚生,总称“三事”,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载舟覆舟,不可不慎,所以第十卷是“政事”。既能治学,又知为政,老而致仕,要当以教学育人为己任,如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之例,而孟子亦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所以第十一卷是“教学”。君子以天下为怀,勇于改过,清洁自守,善始善终,所以第十二卷是“警戒”。儒家治学,讲究醇而不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辨异端而辟邪说”,为的是不失根本而传之久远,“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凡大儒均以传道、阐道为职志,而以溯源导流为当然之理,所以第十三卷是“辨别异端”。儒家所谓“仁道”亦可解释为人道、人文,而做人要当以圣贤自期,以君子自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儒家以君子圣贤为最高境界,所以第十四卷是“总论圣贤”。总之,全书十四卷首尾相济,次第整齐,体现着明显的递进关系。

不过,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卷“道体”在全书中的次序有些特殊,是一个例外。这一卷是依照儒学体系的重要性为标准,而不是入门阶梯的先后次序而设立的。特别是第

一卷的第一段话,全文选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文中开篇一句话,便是“无极而太极”。若论这句话以及《太极图说》的篇名,乃是儒学史上家喻户晓的文献,但若说到人们对它的理解,则几乎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乃在于“无极而太极”本属儒家学说中形上之学的部分,而形上之学的精微之处又并非抽象思辨的逻辑推理,而是介于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转折与连接。“无极而太极”意谓无极即太极;称之为无极,是强调它的形上作用,由此而获得“不已”的性格;称之为太极,是强调它的形下作用,由此而演出“生生”之学;中间一个“而”字,意谓无极与太极亦一亦二,亦分亦合。如朱熹所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朱子文集》卷四十五)又说:“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朱子文集》卷三十六)接下来的几个概念也是如此:相对于无极而言,无极是形上,太极是形下。相对于阴阳而言,太极是形上,阴阳是形下,如朱熹所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气也。”(《朱子文集补编》卷五)相对于一阴一阳而言,一阴一阳是形上,阴阳是形下,如朱熹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四)这样一种既无极又太极、既无形又有理的关系,特别是这种抽象论辩的学术意义究竟何在,远不是初学者所容易体悟的。其微妙几微之处,甚至于仅仅“无极而太极”一句话的版本也都产生出了问题。《太极图说》最重要在首句“无极而太极”一语,而首句原文自宋代已有不同版本,朱熹注本与张栻《太极解》本作“无极而太极”,杨方九江旧本为“无极而生太极”,国史《濂溪传》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有版本“无”又写作“无”)。朱熹极力坚持“无极而太极”是最合理的定本,而认为“自无极而为太极”会“启后学之疑”(《朱子文集》卷七十一),究其原因,均与形上概念的抽象难喻有关。

第一卷“道体”的编纂,是出于“名义”的需要。在《近思录》编成之后,朱熹曾明白表示,第一卷最不易懂,建议学生先看第二、第三卷,慢慢再回头看第一卷。他说:“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祇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在今本《近思录》吕祖谦所作《后序》中,果然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明:“《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

周敦颐在宋明儒学史上受到尊崇,被推为“理学鼻祖”,是自朱熹开始的。朱熹认为周敦颐的儒学其纯粹性超过了

汉唐的董仲舒、韩愈等许多人而直承孔孟，他的《太极图说》更是直承伏羲、文王和孔子三圣。朱熹评价周敦颐说：“以熹观之，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干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朱子文集》卷三十六）“《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朱子文集》卷三十八）。“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若于此看得破，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朱子文集》卷三十六卷）此种评价，在宋明儒学的建立中尚别具意义，这一点容后详议。

二、《近思录》的作者与编订

如果包括了邵雍在内，《近思录》的作者和编纂者共有七人，即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南宋的朱熹和吕祖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改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晚年爱庐山风景，傍溪筑室以居，取故乡“濂溪”命名，世称濂溪先生。历官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与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永州通判、广南东路转运官、提点本路刑狱等，有治绩。为宋代理学鼻祖，从政之余传道授业，程颢、程颐均从之受业。博学行力，黄庭坚称其为人“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菽蕘，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精于易学，发明太极之蕴，能“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宋史·道学传》）。朱熹盛赞周敦颐“濂溪之学，精悉深密”（《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太极》之旨，周子立象于前，为说于后，互相发明，平正洞达，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史称“两汉而下……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宋史·道学传》）。“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黄百家语，见《宋元学案》）”“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贺瑞麟《周子全书序》）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周濂溪集》、《周元公集》、《周敦颐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人，程颐之兄，世称明道先生，或称大程子，与程颐并称二程，其学派被称为“洛学”。进士及第，历任鄆县、上元县主簿，晋城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常丞，知扶沟县等职。《宋史·道学传》称道他：“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溢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

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著有《识仁篇》、《定性书》、《陈治法十事》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弟，世称伊川先生，或称小程子，与程颢并称二程。历官崇政殿说书、管勾西京国子监等职，为洛党领袖。自年十八上书阙下，游太学，后经近臣屡荐，入京侍讲经筵，党争起，窜涪州，移峡州，最后以宣义郎致仕。时人称其“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有经济济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吕公著语，见《宋元学案》）；“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朱光庭语，见《宋元学案》）。《宋史·道学传》称道他：“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著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作“关学”。史称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道学传》）；“本砥弛豪纵士”（《宋元学案》）。“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精思力行，毅然以圣道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宋元学案》）“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宋史·道学传》）。朱熹称赞他是“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朱熹《横渠先生像赞》）。历官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太常礼院。著有《正蒙》、《西铭》、《东铭》、《易说》等，合编为《张子全书》、《张载集》。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安乐，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易学家。祖先为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先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故学者又称百源先生，其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后隐居河南洛阳安乐窝，创立易学象数学派，屡授官不赴。史载邵雍在苏门山，“布裘疏食，躬爨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在洛阳，“蓬荜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人莫能窥也”；“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任意所适”（《宋元学案》）。评价说他“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而康节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宋元学案》）。程颐称之为“振古之豪杰”，又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这个学，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现存的著作有《观物内外篇》、《渔樵问答》、《先天图》、《皇极经世》及诗集《伊川击壤集》等。

朱熹（1130—1200）字晦庵，号晦庵、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居建阳武夷山。二程四传弟

子、周敦颐五传弟子。进士及第，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在官之日虽浅，而政事可观。“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史称朱熹“得程氏正传……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宋史·道学传》）；“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黄幹语，见《宋史·道学传》）。一生著述极丰，有《中和说》、《观心说》、《仁说》等，并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章句集注及或问，为《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三书作解，为《周易》作本义及启蒙，为《诗经》作集传，为《楚辞》《集注及辨证》，编订《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又著《孝经刊误》、《小学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朱子家礼》、《朱子文集》、《朱熹语类》等，著作共二十五种六百余卷，今人汇编为《朱子全集》。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进士及第，历官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直秘阁、主管冲佑观及明道宫等。屡以圣道、治体进谏宋孝宗。与朱熹、张栻为友，一时齐名，人称“东南三贤”。年少时性情下急，一日诵《论语》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懣涣然冰释，遂终身无暴怒。朱熹曾说：“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学以关洛为宗，而长于兼取众长，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史称吕祖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全祖望语，见《宋元学案》）。著作有《东莱集》、《东莱左氏博议》、《东莱书说》、《吕氏家塾读书记》等。

《近思录》的编订是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在《后序》中说：“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朱熹和吕祖谦在寒泉坞相见，共读北宋五子之书，由于早已稔熟于心，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不仅全部条目基本选定，而且条列了卷次，写定了各卷标题，从朱熹的话来看，他的短序应当也是一时写就的，祇有吕祖谦的《后序》，据题款写于淳熙三年四月，是稍后写定的。《朱子语类》中提到，朱熹曾说：“《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在书成以后，朱熹和吕祖谦二人为此还有信函往来，相互磋商，朱熹向吕祖谦建议，由他另写一篇短序，二序同时并列，而署名也由二人同具。《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叶采《近思录集解提要》）。书成之后，又曾有人建议续编《近思续录》，朱熹没有同意。《朱子语类》中提到：“因说《近

思续录》，曰：‘如今书已僂多了。更有，却看不办。’”传世的各种《续近思录》、《近思续录》等约二十种，均为他人效仿之作，所谓“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由此可以相信，《近思录》是朱、吕二人精思熟虑，一槌定音的作品，亦如孔子删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吕祖谦长于兼容众家，举人之善，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一时英伟卓犖之士皆归心焉”，他的参与，对于《近思录》的编选品质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后人过于看重“门户之争”，吕祖谦的署名就出现了问题。《宋史·艺文志》中尚并题二人同撰，后来各本除了江永的《集注》以外都删去了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没能进入包括了朱熹、张栻以及程朱门人在内的《道学传》，而与陆九渊兄弟等人一起被列于《儒林传》中，其中并不提同编《近思录》一事。当然，这件事并不影响《近思录》本身的质量，经过四库馆臣的辨证，朱、吕同撰早已为世人所共知了。

三、《近思录》的整理、注解与流传

《近思录》自南宋至清代，各种注本有二十一种之多，“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笔记讲说无数”（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叶采和张伯行的《集解》、茅星来和江永的《集注》四种。

叶采字仲圭，号平严，建安人。曾任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等职。朱熹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其后约五十年，宋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叶采撰成了《集解》，而他注释此书的经过，却是“朝删暮辑，逾三十年”，故虽作于朱熹歿后，而相去实不甚远。他的集解虽然对朱熹所定各卷标题作了整理，但内容“悉本朱子旧注”。这种“以朱注朱”的做法不仅比较完整的保存了朱熹的原意，更重要的是将北宋五子与作为编纂者的朱熹自己的思想贯穿起来，成为一体，其传道之功，境界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实际上至清代馆臣采编《近思录》时，该书已没有单独的朱熹原本，叶采的《集解》就是最早的原本了。

茅星来字岂宿，归安(一说乌程，均在今浙江吴兴)人，康熙间诸生。他集注《近思录》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认为通行叶采的《近思录集解》和秘藏杨泳斋的《近思录衍注》“读之粗率肤浅，于是书了无发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费拟议处则阙焉，至于中间彼此错乱，字句舛讹，以二子亲承朱子绪论，而其为书乃如此，其他又何论”，其二是感慨文章、训诂、儒学的分离，以及道学与政术的割裂。所以他的集注就广采“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其先后次第悉仍其旧本”，又于名物训诂考订援据不惮其烦而备著汉唐诸家之说。该书篇幅较之叶采增大几近一倍，《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不仅“于名物训诂，考证尤详”，而且“其持论光明洞达，无党同伐异，争名求胜之私”。茅星来集注《近思录》是源于其父茅默存的遗教，其书自序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而后序作于乾隆元年(1736)，前后又有十五年之隔，足见其“殫一生之精力而为之”。

江永字慎修,婺源江湾人。家贫,不仕。好学深思,精通《三礼》,又长于比堪、步算、钟律、声韵,“自汉经师康成(郑玄)后罕其侔匹”(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著作另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等多种。江永生于康熙十九年(1681),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茅星来著成《近思录集注》时,他已四十一岁,即使尚未开始为《近思录》作集注,其成书也较茅星来不远,当是约略同时著书而互不相通。江永《近思录集注》的特点,是清理了叶采以后明代各种流行本的谬误,而其注释体例,也仍然依循着“以朱注朱”的家法。《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至淳佑间,叶采纂为集解,尚无所窜乱于其间。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语,谬误几不可读。永以其贻误后学,因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治。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而为此书,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子者异也。”著成之后,该书即成为流通最广的一种版本。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至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入直南书房,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及会试副考官,授户部侍郎,擢礼部尚书,以居官清廉著称。所至建书院,置学舍,搜求刊布先儒文集。史载张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曰敬庵。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御赐“礼乐名臣”榜,卒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著述有《困学录》、《困学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及刊印《正谊堂丛书》。纂辑集注宋

明诸儒著作多种,计有《濂洛关闽书》十九卷、《性理正宗》四十卷、《二程语录》十八卷、《朱子语类辑略》八卷、《近思录集解》十四卷、《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等。《近思录》一书本以义理见长,重在涵咏其意而不在文字,张伯行以清代名儒而为《近思录》作集解,专由义理一面梳理,务使五子原意圆融贯通,直截平易而又较近原意,其注释方法亦自体现出一种“切问而近思”的精神,在理学的理解和阐释上有高出其他注本之上处。

要之,自叶采至张伯行诸人,均有志于儒学,而以羽翼道统自居,踵武周、张、程、朱,从各个不同方面补充完善《近思录》之所未备,其疏治之功及其“薪尽火传”的精神,均已融入此书,而与《近思录》成为一体。

参考文献:

- [1]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4]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朱熹. 朱子文集[M]. 《四部丛刊》影印《朱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本.
- [6] 叶采. 近思录集解[M]. 《四库全书》本.
- [7] 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M]. 《四库全书》本.
- [8] 江永. 近思录集注[M]. 《四库全书》本.
- [9] 张伯行. 近思录集解[M]. 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 [10]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赵尔巽. 清史稿(儒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2]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3] 永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4] 陈荣捷. 近思录详注集评[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92.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Zhuxi's *Jin Si Lu*

ZHANG Jinhua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Hunan, Yongzhou Hunan, 425006, China)

Abstract: *Jin Si Lu* is a masterpiece written by Zhu Xi for the foundation the Confucian scholarship system. It was edited by Zhu Xi and Lu Zuqian. It is a collection of speaking and doing of the famous theorists Zhou Dunyi, Chen Hao, Chen Yi and Zhang Zai in North Song Dynasty,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editors' opinions. Consequently, *Jin Si Lu* is a quotation of the four theorists as well as an excerpt of the common thought of the six people mentioned above.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Jin Si Lu* was used as an introductory and enlightening book for scholars, whose influence was the greatest and widest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Jin Si Lu*; Zhu Xi; Lu Zuqian; edit; spread